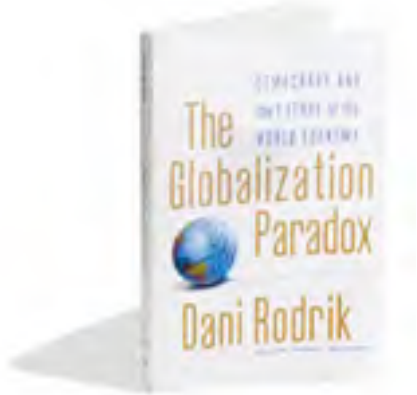


## 瘦身的全球化



达尼·罗德里克

### 全球化的悖论

#### 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

W.W. Norton & Company, 纽约和伦敦, 2011年, 288页, 26.95美金(精装)。

达尼·罗德里克一直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批评者。他这本出色的新书是其早前一本著作的续集, 后者探讨了国际贸易对各国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的影响, 这种影响时常具有破坏性。这本新书拓展并深化了这一主题, 从而纳入了对金融全球化的讨论。这同样是对当前国际秩序民主正当性的探讨。罗德里克通过考察世界经济该如何加以改革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作者抨击的对象并不是全球化本身。他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因为如果这两者处于合理的控制之下, 将有可能带来高速的经济发展。他所批评的是“亢奋的全球化”, 后者旨在全面消除贸易和金融壁垒, 并严格限制各国政府干预本国经济的自主权。几十年来, 经济学专业领域和某些国际机构的“市场正统派”一直在推行这种纲领。

罗德里克在两个层面上反对正统方法。首先, 这种纲领基于某种粗糙的经济理论, 这种理论很少被运用于实践, 而且与历史经验相悖。在刚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阶段, 大多数如今的发展中经济体正在积极推动工业化, 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资本控制、补贴, 以及对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约束。这种描述适用于近期的中国和印度, 并且现在这种情况更甚往昔。此类政策虽不能保证成功, 但是很少有穷国在没有这些措施的情况下腾飞。

我们还需要考虑国家主权。即便正统派所鼓吹的纲领是正确的, 我们也没有理由将之用于被认定的主权政府。每个国家都有做错的权利, 只要不对他国造成重大损失。国际体系需要秩序, 但这也要有弹性, 而且要给各国政府更多尝试的自由。这就是在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情形。该体系在其全盛期推动了经济发展, 并调和了国家自主权和国际秩序的矛盾。

市场正统派还常常抱有这样的观点, 即单一民族国家是过时的——它们将被全球资讯的传播和市场的力量所削弱, 它们的角色将逐渐被超国家机构所取代。这一进程的逻辑终点是世界政府。罗德里克怀疑世界政府的可能性的, 他对其可取性的怀疑更甚:

“对于各个国家而言, 这个世界具有太多的多样性, 使其无法遵从统一的法则, 即使这些法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民主进程的产物。全球标准和监管不仅不切实际, 而且是不可取的。民主正当性的约束将使得全球治理成为最小公分母——一个脆弱而无效的规则框

架。接着, 我们将面临治理过少的巨大风险, 因为国家级的政府放弃了责任, 而这没有其他机构来承担。”

罗德里克认为, 世界政府的替代方案是强化单一民族国家的地位。他将之归结为全球改革的七条准则, 这种改革将极大地恢复各个国家的政策自主权(布雷顿森林崩溃后, 这些国家就丧失了这种权利)。

虽然这些准则具有吸引力, 但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某些问题。例如, 准则七声称: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 非民主国家不可拥有和民主国家一样的权利和特权”。传统上, 中国不被归为民主国家, 因为它是缺少自由选举的一党制国家。但该国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其不属于民主国家而对其惩罚, 可能会令其所取得的成就落入危险境地。这种秩序也将自讨苦吃。中国很快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规模, 并且不会友善对待这种干预。

这提出了更具一般性的问题。罗德里克所提议的改革的政策构成是什么?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取而代之的自由市场体系都是由美国塑造的, 当时其更富有的同盟国与它们的优先权是一致的。当巴西、中国、印度和其他经济巨头崭露头角时, 世界力量的平衡正在转移。没有了这些未来的超级大国的支持, 任何改革提案都不会成功。我很想看看这些国家对罗德里克的理念有何种反应。

罗伯特·罗森  
(Robert Rowthorn)  
剑桥大学名誉教授

# 储备的优势



巴里·埃森格林

## 过高的特权

美元的衰落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11年，224页，27.95美元（精装）。

巴里·埃森格林的新书恰逢其时：2010年9月15日（金融服务公司雷曼兄弟倒闭整整两年），这一天日本央行压低日元的干预措施引发了韩国和巴西的强烈反应，并打破了中国和美国在人民币价值上的僵局。新一轮的货币战争打响了，很多人担心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压低币值的举动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并激化国际间的摩擦。

埃森格林以一个更古老的问题开篇——与其说为了贸易优势操纵弱势货币，不如说利用力量上的优势。美国如何从美元所扮演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中获益？什么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政治家们所抨击的“过高的特权”？是否可以只有一种主要的储备货币？

埃森格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优雅而精炼。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并不是储备货币的地位带来了巨

大的权力地位，而是安全港的角色带来了巨大的权力。私人 and 官方投资者都愿意接受在美国的较低的投资收益率，这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安全的国度，拥有众所周知且不断强化的法律规则。当其权力逐步丧失，技术分散的赶超效应蚕食了其经济优势时，一个更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可能将取代美元的霸权。

埃森格林解释了特定政策倡议如何导致美元快速上升为主要的世界货币。对于190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改革而言，其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令美国商人可以使用美元承兑，以取代通过伦敦以英镑为国际贸易融资的方式。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创设是为了支持一个新金融中心的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美元成为了主要的储备货币，而一战后随之而来的余波体现出多货币体系是行之有效的。埃森格林同样记录了欧元这个新的挑战者的崛起。

新的全球货币（首先是美元，然后是欧元）可以迅速出现，就像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德国马克那样。埃森格林将人民币看作可能的主要储备货币，但他认为中国的领导力还不足以应对经济自由化。他认为中国的情况更接近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当时的日本正与可能导致日元全球化的潮流作斗争），而不是当时的西德。

除了现存货币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成为国际兑换媒介呢？埃森格林考察并排除了回归金本位或使用其他标准商品的可能性。一个更具吸引力和更流行的设想是采用IMF创造的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SDR创于1969年，被用作成员国官方

储备的补充，它的价值基于四种主要国际货币的篮子，并能与大量的可用货币进行兑换。但埃森格林怀疑将SDR用作通行国际兑换媒介的可行性。他将这种全球货币形容为“在抽象条件下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只要没有一个全球政府为其行动负责，就不可能出现全球央行。”

作者关于全球货币的章节似乎与其关于欧元起源的讨论不一致。欧元正是由一家央行发行，后者既不受任何一个政府的控制，也无需对政府负责。欧元产生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是货币合作方面的持续性尝试。美元弱势时，欧元应运而生：冲击并打破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价体系，而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货币当局的管理不当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欧洲的合作同样受制于在讨论世界货币篮子时所指出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欧洲设法推动私人使用欧洲货币单位（ECU——欧元的前身）。虽然当时已有债券与信贷以ECU发行，但这样的合成货币市场被证明难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剧烈的汇率危机中存活下来。

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了美元迅速崩溃的可能性，在埃森格林看来，最有可能的是失控的美国财政赤字造成这种崩溃。他认为2010年的欧元危机已经迫使欧元国家开始了财政整顿，但美国进行类似改革的政治支持将会很少。

哈罗德·詹姆斯  
(Harold James)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学教授

## 对中国的误解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 龙的礼物

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真实故事

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纽约，2009年，397页，23.96美元（精装）。

中国正在非洲和关于非洲经济的讨论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援助、贸易和投资的绝对规模，不如说是因为上述三者的快速增加。非洲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援助者以及国际组织对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的收益与成本既抱有热忱的态度，也夹杂着疑虑。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新书并不是第一个关注这一话题的，但是她致力于以中国的视角（来自官方和非官方渠道，且有的曾被公开，有的则尚未公开）讲述中国在非洲的经验，从而使这本书脱颖而出。布罗蒂加姆是此类书籍的作者的不二之选：她曾学过中文，并在中国和非洲工作了超过20年，她开展了大量工作，其中很多是关注于中非双方的经济关系。

《龙的礼物》的优势在于，它包含了大量且详实的关于在非洲

的中国政府官员、中方工厂管理者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参与者与观察家的访谈。通过这些采访，作者传达了很多中国人关于如何将其经验使非洲受益的看法。她同样记述了中国人和非洲人对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资项目的看法，包括这些项目的成功、所遭受的挫折以及失败。其中的话题包括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中国经理人和非洲工人在工时和工资问题上的摩擦；与西方的援助者和投资者相比，中国经理人和工人因援助和投资项目的大量涌入带给非洲人的挫败感（虽然中国专家的人力成本要远低于西方国家）；以及在谁将对引进技术和管理知识时的失败负责这一问题上的相互指责。

布罗蒂加姆教授令人信服地反复阐述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如何时常遭到误解。她特别指出，人们常常混淆中国国企的公司投资和中国对非洲的外国援助（中国的政策明确地偏重于南南合作的互利机会）。她还引用了经常被误解的公开发表的报告和演讲（例如由数据的错误翻译或混淆美元和人民币数据所造成的误解）。

《龙的礼物》提出，关于中国向非洲的援助、贸易和投资流入的报告时常被夸大，而且有时这种夸大非常惊人。本书还解释了中非两方之间的贸易额如何快速增长（尽管基数较低）。布罗蒂加姆还试图呈现阻碍中国进一步参与到非洲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其中包括腐败（书中证明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论点，中国政府的援助直接转给了被选定实施非洲投资项目的中国机构——这些资金常常根本就离开中国，这限制了非洲的官员转移资金的机会）。

但是，这本书的优势也与它的主要不足紧密相连。鉴于布罗蒂加姆教授主要关注于中国的援助和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此书不可避免地严重偏向轶事性的叙述。这与世界银行的哈利·G·布罗德曼在《非洲的丝绸之路》中采用更偏重数据（但也更偏重贸易和投资）的研究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如，当布罗蒂加姆试图估算2007年中国流向非洲的援助额时，她不得不采用了这种轶事性的方法。她对这一金额的估算利用了：（1）中国进出口银行全球优惠贷款的2001年的数据；（2）从一份2005年的年报中得到总的优惠性外国援助贷款的年增速，以此由2001年的数据外推得到2007年的数据；（3）2003年年末，一位中国官员和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的谈话记录里提到了之前四年流向非洲的援助的份额。如果想获得其他主要援助方的类似数据，我们只需要寻找公开发表的数据记录即可，但作者反复强调中国政府将外国援助、合同条款的量化信息以及大多数相关数据视作国家机密。

尽管有这些不断被提及的困难，但作者对中国政府透明度的批评却很少，而且并不明显。她引用了一句古老的学术谚语：“‘轶事’的复数不是‘数据’”，在可以得到更好的信息之前，继续这种轶事性的描述还是有用的。即便如此，书中的报告和访谈录的可靠性还是会让读者略感失望。

托马斯·多罗西  
(Thomas Dorsey)

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顾问